



## 为什么是南昌

□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谢龙龙 文/图

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119号,有一个中西合璧的赣派建筑群,由两栋砖木结构楼房、一栋平房及配套园林组成,院内松柏、竹林、香樟等绿植郁郁葱葱。这里原系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始建于1915年,北伐战争后,先后成为朱培德、王钧等人的住宅。八一南昌起义,张勋公馆成为激烈的战斗地点之一。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驻此地办公。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见证了南昌城和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承担起组织指挥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9月2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推出基本陈列《铁军出征——新四军从这里走来》。灰白的旧照片、斑驳的老物件,都在述说着新四军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故事,提醒着后人永远铭记那段血火淬炼的岁月。

### 新四军的诞生

新四军的源头,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南方八省、赣粤边、闽赣边、皖浙赣边等15个游击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周密部署,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及南方各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留在根据地的部队在策应、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任务后,进行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调集数十万重兵,对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展开“围剿”,苏区革命形势十分严峻。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在以信丰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同时,南方八省15个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动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重手段,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挫败对方的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经济封锁,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和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在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迎来新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

1935年至1937年,在南方活动的红军游击队为形势所迫,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国共两党重启和谈时,如何找到失去联系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告知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组建一支整体力量,成为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考虑的问题。粟裕《战争回忆录》里记录了一段往事,1937年9月,在经历三年游击战争之后,部队终于得到了国共合作的消息。面对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谈判代表提出的请他们“下山进城”的企图,他们明确指出:“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这段回忆侧面反映了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底线及对改编的警惕。

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国民党缺乏诚意,双方对改编人数、领导人选等问题迟迟不能达成共识,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周恩来在参加第二次国共谈判之后到达上海,遇见了从澳门来沪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叶挺,他委托叶挺出面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叶挺欣然接受。因发动起义,叶挺在海外流亡10年,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由他主持改编工作,国民党易于接受。

淞沪会战爆发后,在面临巨大危机的形势下,蒋介石同意叶挺的建议,以北伐战争时期有着“铁军”之称的第四军命名待改编的南方红军游击队。

至此,国共双方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要问题基本达成协议。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宣告成立。

### 为何“军部第一步设南昌”

事实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初新四军“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为何后来军部移驻南昌呢?

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到新四军成立前。叶挺被蒋介石单方面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后,出于谨慎,中共中央去电询问叶挺能否到延安。1937年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和主要干部配备的方案,并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去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落实中央的意见。“军(部)暂驻武汉”的指示正是此时发出的。叶挺离开延安,到达武汉后,根据这一指示开始筹建新四军军部。但鉴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活动的8省,其余7省与江西互相联系,为了便于集中改编和就近指挥抗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12月23日,项英抵武汉,与叶挺会面,商谈新四军的筹建问题。通过交谈,统一了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组建方案的认识,包括先组建新四军军部,随后集中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军部在汉口成立后,迅速迁往南昌等。两日后,军部成立。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进驻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正式对外挂牌办公。军部在南昌开始高速运转。

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是顺应抗战局势、革命任务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南方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八省四十多个县,人员分散,通信落后,相对周边游击区,省会南昌中心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南浔铁路、浙赣铁路和赣江水运等连接周边,有利于加快完成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便于抗战时运输物资和部队调动。”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熊河水说,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在江西留下了革命火种,南方八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陈毅等也在赣粤边地区进行革命斗争。

赣粤边游击区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江西是红军改编的主要舞台。“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是较早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游击队之一,对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影响很大。”熊河水介绍,江西的国共会谈、合作抗日在南方八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937年8月、9月,陈毅多次在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最终就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事宜达成协议。在赣粤边谈判取得成功后,9月下旬,项英在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就国共合作、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谈判,成功解决南方各地区红军武装改编事宜。“南昌谈判”成功后,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改编,并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

可以说,南昌与人民军队有着不解之缘,在创建革命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后,南昌再次承担组建新四军的历史重任。这支从南方深山密林中走出的铁军,以猛虎下山之势,以南昌为支点,奔向大江南北,如一把利剑插入华中敌后战场。

### 新四军在南昌的日子

“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还有一个重要考量,就是重建南昌乃至江西的党组织。八一南昌起义后,江西各级党组织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此时迫切需要党组织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挥抗日救亡。”熊河水介绍。

红军游击队在改编的过程中,各游击区不仅加强了联系,“南昌谈判”后,失联了3年之久的中共中央分局与党中央,也恢复了联系。在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的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中革军委新四军分会也在南昌一并宣告成立。江西的各级党组织得到有序恢复和重建,如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导下成立中共南昌市委,而后中共江西省委重建,中共南昌市委改由中共江西省委领导。

移驻南昌后,新四军军部首要任务就是把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迅速集结起来,进行集中整编,组建抗日铁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6

日至4月4日,短短3个月里,新四军军部顺利完成了各支队的整编任务。整编后全军辖4个支队,共计1.03万余人。部队人数不多、装备落后,但绝大部分人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期间,很快建立健全了各部队机构。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设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等;政治部设有秘书处、组织部、民运部、敌工部、战地服务团等。新四军机关干部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党中央从延安选派;二是来自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三是来自沦陷区、国统区及海外归来的地下工作者、爱国进步人士、左翼文化人和爱国知识青年等。南昌作为新四军军部正式运作地,为新四军的迅速组建及后续发展壮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军部在抓紧进行组建新四军、指挥部队北上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化抗战,通过各种方式巩固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如举行公开的情势报告会和各种座谈会,教唱抗日歌曲和举行联欢会。战地服务团、青年服务团等大批抗日爱国团体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生活书店、大众文化社等书社出版和发行了大量进步书籍,抗战文艺如火如荼,抗日标语遍布街头,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南昌一度被誉为“南方的延安”,吸引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各阶层各方面进步人士。

此时的南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枢,吹响了向抗日前线进发的冲锋号。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开往抗战前线,各界人民赶到火车站送行。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一首诗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心情:“冒着黑暗奔走,祝福你,在黎明之前,加入战斗的行列。”

新四军的成功组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方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开辟华中敌后战场、迅速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具有深远意义,被誉为“华中的人民长城”。

正如新四军军歌所唱的:“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他们是打垮日本帝国主义的钢铁长城,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8年,新四军司令部的同志在南昌合影。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高升巷1号张勋公馆

(压题图:左为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右为油画《南昌谈判》。)

### 对话

## 傅菲：想成为稻子和麦子

□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谢龙龙

不久前,作家傅菲新作《深山欲雪》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这部散文集被希腊瓦西康出版社引进,将翻译成希腊文,在希腊语国家出版发行,向世界读者展示江西生态文明。于此,我们特邀傅菲畅谈创作感悟——

### 深度认知是写作的第一位

《深山欲雪》以江河、荒野、虫鸟、物则、茶食为主题切分五辑,书写了山涧、草木、鱼鸟、山民的命运。在书中,作者耐心地观察草叶上的甲虫,探寻泊水河的源头,眺望逆流斗水的鱼,聆听即兴演唱的画眉,手植赏心悦目的木槿……万物蓬勃生长,时间过得缓慢,无用的小事里藏着巨大的安宁。

傅菲长期客居大山乡村,深入调查田野。这一次,他驻扎德兴市大茅山3年,实地探访了山林及周边村落的每一个角落。傅菲说,自己每天先是去山坞看山民种菜养鱼,与他们交谈,去山麓观察动植物,之后去探寻峡谷溪流。

事实上,他从小对大茅山的南麓和东麓比较熟悉。傅菲生长于上饶市广信区郑坊镇,离大茅山50公里。如同热衷为家乡的饶北河创作一样,傅菲在《客居深山》中就以大茅山为背景展开过叙事。“不一样的是,《深山欲雪》更加深入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时间的变迁对自然和生命的作用。”傅菲说,20世纪80年代,大茅山周边峡谷聚集起众多居民,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人们逐渐远离山林。人退物进,曾经不见的动植物回来了,大茅山展现出物种的多样性。带着好奇心和探索欲,傅菲钻进了这荒野山林之中。

到达自然现场,对自然万物与自我内心产生深度认知,是傅菲进行深度写作的前提。写作时,他对各种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学名和习性信手拈来。“我不依赖灵感写作,也不会虚构,在我这里认知是第一位的,必得先到达自然现场。”傅菲说,除了长期野外观察,也自学了一些生物学知识,遇到不认识的动植物就去请教专家,这成了他与自然对话的前提。

在那里,傅菲认识了大茅山的自然之美和山民的人情之美,获得了内心的丰盛感受和自然的生动形象,这构成了他叙述的底色。

### 自然之美能被欣赏和共情

每次进入大茅山,傅菲都会想起美国作家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想起他心贴大地生灵,用土地美学概念描写荒原。这让他如痴如醉。

傅菲说,行走山林,还有一个戴着白草帽的约翰·巴勒斯陪着他。傅菲特别喜欢这位自然文学作家,曾经进入山林都会随身带着他的书。“一百多年过去了,还是喜欢读他,读他对山川自然的热爱之情,享受山川自然的愉悦之情,即使没去过美国,也不妨碍读者读懂他。”傅菲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林中遇见约翰·巴勒斯》。

此外,傅菲还深爱爱默生、梭罗、奥尔夫多·利奥波德、吉尔伯特·怀特等作家的影响,他们启发了傅菲从艺术美学和哲学思索上去感知自然。

梭罗等作家的自然文学作品风靡世界,一本中国的自然文学作品《深山欲雪》能否被海外读者接受?傅菲比较乐观。“西方读者可能不熟悉中国南方的自然景观,不明白那是什么树,但他只要知道这是一棵乔木就可以了,它所呈现出来的自然气质的共性和一些特质性的东西,是能被记住的。《茶食记》中腌菜熬糖等生活细节极具地域特色,能够激起西方读者对慢生活的共鸣,它呈现了人类对食物的耐心,以及食物的色泽、味感等,体现了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是能被欣赏和共情的。”在傅菲看来,人的自然禀赋与生俱来,自然文学呼应时代需求,全球都市人对自然的渴望和追求是强烈的、一致的。

傅菲的语言风格和思考方式,受到了中国诗歌和希腊诗歌的影响。他喜欢王维、陶渊明等中国古代诗人,也喜欢扬尼斯·里索斯、奥德修斯·埃里蒂斯等希腊现代诗人,他在书中提出的“自然之物只是人类临时保管”的观点,与埃里蒂斯“疯狂的石榴树”的核心意象形成有趣的对话,是东西方生态哲学的奇妙共鸣。

在《深山欲雪》中,自然在自我修复中勃发,一些消失的物种重现。“大地是有生命的,万物是一种互动的、互生的、互融的关系,海外读者可能会有感触。”

“乡野带给我们最真实的快乐。”傅菲热爱自然,也希望让更多人爱上自然。

### 自然文学在于表现人和生命

大茅山留有很多生活印迹,如废弃的屋舍、破败的林场、腐烂的蜂箱、长满荒草的耕地和野路……人在离场后,把自然交还给了草、树、鸟和野兽。傅菲认为,人只是借居大地,“唯有生命的更替,让大地繁盛如初”。

人离开村庄,房屋就死了;水无鱼,河就死了。“山里随处可见生命凋零,也随处可见生命新生。我们要看到万物相互依存、相对平等,尊重自然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合理有限地利用自然,学习自然精神及其真善美。”

问道于自然,也问道于人世,这是《深山欲雪》所要表达的主题。傅菲记录山川风物,也关注当下生活。书中记录了大量山民口述史,有关山民的家族流变、日常生活、迁居史、方言、邻里关系等,傅菲还去山民家里吃饭,跟垂钓者交谈,看妇人洗衣服,请山民做向导,这里有着许多让他震撼的生命个体。

“自然文学不可能避开人纯粹地谈自然,任何书写都有作者内心景象的反映,我们在探寻荒野的时候也会遇到许多的人。2023年在绕三镇的一处峡谷中,有个村子只剩下两户居民,其中一户是浙江移民,他们的子女已经去了城市,尽管在当地生活了五六十年,但他们在融入村民的过程中,无论生活还是内心,都是很难的,显现出留恋向往故乡但又回不去的状态。大茅山周边有着大量移民家庭,子女外出,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硬朗,在山里种红苕、养蜜蜂、采油茶、收葛粉、吃土货,他们扎根大地,与山林为伴,淳朴热烈的生命状态令我震撼。”傅菲认为,人最终会归于大地。

在傅菲看来,江西山水美人美,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一些动植物独一無二,鄱阳湖、庐山等独具标识,是文学创作的“富矿”,自古以来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名篇佳作。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饶北河的书。这条河作为一种时空坐标符号的存在,傅菲一直在书写它沿岸的人、它的生生不息。

傅菲说,如果能化身自然之物,自己想成为稻子和麦子,这是离人类最近的草本,普通、有爱。